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 張頤武

一

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上進行的有關中國大陸「後學」的討論已持續近兩年了。兩年來討論的參與者正在增加，而其涉及面也越來越廣。許多海外學人對這一討論的強烈參與熱情及這一討論在中國大陸內部引發的強烈興趣，都說明了「中國」當下的狀況業已引起了普遍的關注，「闡釋中國」的焦慮在這樣的發展中也已「全球化」了。我們在這些討論中可以發現，無論持何種觀點的論者都無法逃避「冷戰後」新世界格局之中的「全球化」的衝擊。而他們的不同論點、知識及話語背景，也反映了「全球化」的衝擊帶來的錯綜複雜情勢。討論的發展恰恰證實了「中國」本身正是一個交織雜糅的「混雜」形象，它聚合了無數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欲望，不同的文化想像和價值選擇。在這裏，「闡釋中國」的焦慮並未因這兩年來的討論而減輕，而是更加清晰地凸顯了它的嚴峻性。「闡釋中國」不是一系列預先設定、無需討論的結論，而是一個不容迴避的、尖銳的問題。目前最需要的是在討論中批判或攻擊自己的論

敵，而是如何認真地建立一種「闡釋中國」的問題意識；不是急於宣布自己業已擁有或發現了永恆的、不容質疑的「真理」，而是重新檢視和反思自身與論敵的論點，認知其差異性。否則討論雖很熱烈，但卻只會淪為一種不斷的「同義反覆」，而不能真正有所進展。

經過兩年的討論，分歧已十分清楚，它集中於兩個領域：一是如何認知西方「現代性」對中國的作用，也就是這一話語是否具有絕對的價值而無需進行反思和追問？它是否天然具有「普遍性」？二是如何理解「全球化」的挑戰，也就是說「全球化」是否就一定要按西方的話語改造中國，「全球化」是否就是「西方化」？實際上，具體文字上的差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這兩個關乎中國文化發展的關鍵性問題上存在着「不同選擇」^①。這不僅是一個理論性課題，也是與今天正在中國發生的文化實踐密切相關的問題。本文試圖對這兩個問題再度申說一個所謂「後學」的當事人的立場，為討論提供新的參照。因為所有在討論中涉及的具體分歧，正是這兩個關鍵性問題的展開。

有關中國大陸「後學」的討論，分歧已十分清楚，它集中於兩個領域：一是如何認知西方「現代性」對中國的作用；二是如何理解「全球化」的挑戰，也就是說「全球化」是否就一定要按西方的話語改造中國？

二

對中國「後學」^②提出的指責和批評集中於三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政治論的。它指認中國的「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順應了第三世界中具有壓迫性的官方權力利益，成為官方民族主義和威權內政的文化闡釋人」^③，甚至被指認為中國政府的「外交部發言人」^④。這些表述均認定中國的所謂「後學」乃是當下中國政治合法性的辯護。幾乎所有海外的「後學」批判者均強烈地訴諸一種政治評判，他們均認為中國「後學」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及對於「冷戰後」全球格局的分析，乃是與中國大陸官方的「合謀」。第二個方向是道德論的。它指認中國「後學」與大眾文化合謀，喪失了精英知識份子的立場，放棄了啟蒙的神聖立場，「將把整個中國知識界帶上媚俗的自殺之路」^⑤。這一論點乃指認「後學」缺乏道德的合法性，它對於「現代性」的追問乃是為社會道德的墮落打開了道路，它將「後學」推向了一個道德負面的位置上。第三個方向則是經濟論的。這論點認定中國尚未「現代化」，因此根本談不上「後現代」的問題。在中國大陸內部有關「後現代」、「後殖民」問題的討論中，此類議論甚多。在1992年，一位論者就曾以戲擬式的語氣勾勒了這種流行表達：「說中國不會有後現代主義，則是從社會文明的水平講的，就好比說洋人已進入後工業社會啦，中國還早着哩等等。」^⑥這論點認為中國仍處在「前現代」時代，根本無法討論「後現代」問題。以上三種對「後學」的不同批判或質疑，彼此是互有矛盾的。前兩種批評乃是一種價值評判，認為「後學」只具有負面價值，它雖然與中國當下的社會狀況有關，但卻是一種價值上「壞」的理論。後一種批評則認

定「後學」完全是對西方流行理論的機械模仿，是對不存在事物的虛幻陳述。前兩種批評認為這一理論在中國發揮了作用，而後一種批評則根本否認這點。它們之間也存在着自我矛盾。而在許多人那裏，這三種反「後學」論又混合在一起，形成了有趣的景觀。

實際上，三種反「後學」論的思想背景和話語前提是完全一致的，它們都源於我在上節提出的兩個關鍵問題的絕對化和簡單化的選擇。它們都無可爭議地認定「現代化」的西方價值是人類共同的理想目標，這一目標天然地適合於第三世界社會。而「冷戰後」的所謂「全球化」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全球文化「西方化」的過程。在這裏，這種反「後學」論還並不是僅僅如劉康所說的「市場萬能的意識形態」^⑦，而是要求這一市場完全按照西方式遊戲規則來運作，要求其價值觀及認識論完全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人權」的主流意識形態來編碼。這些論者不單以一種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式的姿態宣告了「歷史的終結」，他們甚至將這一「終結」以異常明確的表述移入了中國語境之中。在這裏，三種反「後學」論從不同角度提供了超驗的、絕對的「元價值」。對於政治論的反「後學」論來說，西方的「民主、自由」應是一切社會無限趨近和模仿的理想生活模式。在這裏，郭建先生的〈文革思潮與「後學」〉一文思路極為奇特^⑧。在他的論述中，西方理論家的思想受過「文革」思潮的影響，竟變成了當代中國「後學」不承認「文化大革命這一慘痛的歷史教訓」的論據。於是他認定：「如果『後學』與這一歷史視角或歷史坐標相悖，我只得冒鼓吹經驗與理論『二元對立』之險，作出『絕對』的價值判斷。」^⑨在這裏，彷彿中國人除了選擇「文革」之

對中國「後學」提出的指責和批評集中於三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政治論的，第二個方向是道德論的，第三個方向則是經濟論的。這三種反「後學」論都認定「現代化」的西方價值是人類共同的理想目標，天然地適合於第三世界社會。

對比徐賁先生在《二十一世紀》和《文學評論》上發表的兩篇文章，的確啟人思考。為何他在海外刊物上強調的「消極政治傾向」在大陸就消失呢？而在大陸強調的「歷史意識」何以在海外就變成了政治問題呢？這凸顯了他迎合不同讀者、在不同空間中爭取「商業價值」的良苦用心。

外，就只有選擇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一途了。這種極為可笑的邏輯，劉康已進行了深入的分析^⑩，這裏無需再展開討論。但這裏的「『絕對』的價值判斷」卻是異常清晰明快的：不成為西方主流思想的「臣屬」者，我們就只有沉入「文革」的苦難之中。我相信任何對今天的中國稍有了解的人，都無法認同這一邏輯。對於「道德論」的反「後學」論來說，西方的啟蒙思想及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也是天然合理的，它們都具有絕對的普遍性。他們由此急於洗去啟蒙思想與殖民主義間的錯綜複雜的聯繫，急於將啟蒙的歷史性加以擦抹，彷彿任何中國人只能無條件地「臣屬」於西方的「人性」觀方能成為「人」。這類極為簡單的邏輯所構築的二元對立是令人震驚的。至於「經濟論」的反「後學」論則是最不了解中國經濟及社會進程的。在中國如此迅速地進入世界體系，跨國資本大量湧入及經濟高速成長的今天，將「中國」視為張藝謀、陳凱歌電影中的蠻荒之地，卻只能是極為可笑的。中國確實仍有不發達和貧窮，仍有複雜的經濟問題，但這些問題卻絕不僅僅是「時間上滯後」的結果，而且亦是當代「全球化」本身的困擾。經濟論者這種天真的論調實際上最為脫離世界與中國的經濟及社會進程。

這裏的問題的關鍵正在於一種福山式的歷史觀拒絕了任何對當下中國的具體情況的思考。在這裏，兩個不容質疑和反思的神聖幻想，淹沒了任何面對「中國」的「問題意識」。在這裏，「現代性」是唯一的、絕對的終極目標，而「全球化」也只能是「西方化」。這樣簡單的思路絲毫無助於我們清醒、具體地「闡釋中國」，而只能極為粗暴地對待當下中國所出現的深刻變化。

這裏有必要提及徐賁先生兩篇

文字多有重複、內容大同小異的文章。一是他發表於《二十一世紀》1996年8月號上的〈甚麼是中國的「後新時期」？〉，二是他發表於中國大陸《文學評論》1996年第5期上的〈從「後新時期」概念談文學討論的歷史意識〉。這兩篇文章最好地說明了反「後學」論的若干難解的矛盾與困境。這兩篇文章雖然有三分之二以上篇幅完全重複，但側重點卻有極大差別。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的文章強調的是一種「政治論」的表述。他在文章結尾處明確指出這篇文章乃是「批評『後學』在中國的消極政治傾向」^⑪，文中反覆指責「後學」的「後新時期」概念未能點出1989年的特殊作用^⑫。但在《文學評論》發表的文章中，有關「消極政治傾向」的若干段落均被刪除，而添加了有關「文學史」及文化史發展階段的討論。本文註^⑬所引述極為關鍵的段落均被刪掉，「後學」的問題被指認為「缺少歷史意識」。這兩篇在文字上大量重複的文章的變動，的確啟人思考。在海外刊物上所強調的「消極政治傾向」為何在大陸就消失呢？而在大陸所強調的「歷史意識」何以在海外就變成了政治問題呢？我絲毫無意懷疑徐賁先生的「知識勇氣」，我也願意相信他絕無「避實就虛，捨近求遠」的想法，但這種意味深長的變動顯然凸顯了他迎合不同讀者、在不同空間中爭取「商業價值」的良苦用心。「在做作的政治及商品經濟的利用下」，「政治傾向」或「歷史意識」也像徐賁先生在他引發這一討論的第一篇文章中所點明的「被道具化了」^⑭。它們在不同的語境中被不同的讀者所消費，而中國「後學」的形象也就被以海外／本土的不同面貌漫畫化了。

這兩篇文章的矛盾之處還遠不止此。徐賁先生與張隆溪、趙毅衡諸先

生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並未否定西方「後現代」理論的價值，而是認為「『後現代』理論真正對我們有所啟發的是對關於『現代性』的僵化觀念的批判，而不是對『現代性』本身的否定」。他點出的「現代性」的僵化觀念包括「個人是自我完足的主體，科學理論凌駕於批判理論、歷史和社會發展的鐵的法則、西方現代是全球的普遍性模式等等」^⑨。中國「後學」從未將「現代性」簡單地否定，而是同樣去反思這些「僵化觀念」。但如果沒有這些「僵化觀念」，「現代性」究竟是以甚麼形態表現出來呢？徐賁先生的論述顯然缺少理論上的依據。他列舉的這些所謂「僵化觀念」，恰恰乃是「現代性」在中國社會中的最清晰的表徵，也是中國「後學」不斷加以分析的重要內容^⑩。這裏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徐賁先生在此僅僅是捍衛「現代性」這一空洞的能指，而將它的內容劃進了「僵化觀念」之中。這說明盲信與幻想一旦被建立起來，就無法再建立問題意識，也就無法冷靜平和地面對事物。

總之，正是由於在「現代性」和「全球化」這兩個領域中的簡單刻板的二元對立，導致了這些值得反思的思考方式及文化立場。目前我們需要一種新的「闡釋中國」的願望與耐心，而不是刻板的、機械的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中遺失的，正是對「中國」的認真探索。

三

中國「後學」在「後新時期」的文化發展中業已顯示了它的活力和可能性，這並不意味着它是一種絕對的、不容反思的理論，而是說它已在不斷進行的「雙向闡釋」之中形成了自身的理論特色。作為一個局內人，我無意

也無法對此進行分析。我只能提出兩個努力的方向，而我以為這樣的努力與嘗試乃是謹慎地避免簡單化與刻板化的必要途徑。

一是建立一種「實踐意識」。在目前全球化與市場化的複雜多變的文化情勢下，堅持理論的「實踐意識」、不斷關切現實的文化狀態，乃是保持理論活力的前提。「後學」的工作始終堅持進行文化闡釋、着眼於具體的本文與潮流走向的分析，主要的原因在於從中國「後現代」理論在80年代發端時起，它就處於闡釋活動之中而從未化為一種抽象玄虛的理論。無論是對實驗小說、新寫實小說的分析，還是對於中國大眾化的闡釋，以及近期提出的有關「新狀態」及「社群文學」的概念，都是試圖將理論「微型化」，不斷地與中國文化本身發展相契合的嘗試。理論並不是一種包醫百病的靈藥，也不是能將文化現象生硬套入的箱子，它乃是一種能動的力量，一種質的存在。它總在「旅行」、變化、轉換之中，它只能是實踐的永不間斷的反思。

二是建立一種「問題意識」。在這裏，理論實踐都還只是有待思考的問題，而不是確定的結果。只有不斷將自身「問題化」，理論才可能不斷改變，而闡釋才可能開始。提出問題而不是急於下結論，乃是一個批評理論工作者的必要工作前提。無論是知識、話語，還是本文，都不能被先驗地給予「『絕對』的價值判斷」。任何這樣的判斷只會走向盲信。

因此，在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之時，理論批評能否在實踐意識／問題意識之中找到新的空間，乃是一個有趣的課題。所謂中國「後學」的存在並不是一種完美理論的生產，而是不斷地尋找新的「闡釋中國」的可能。我想，它的形象並不像那些漫畫式的論

中國「後學」在「後新時期」對實驗小說、新寫實小說的分析，對中國大眾化的闡釋，以及近期提出的有關「新狀態」及「社群文學」的概念，都是試圖將理論「微型化」，不斷地與中國文化本身發展相契合的嘗試。

者所勾畫的，而是像蘇加 (Edward W. Soja) 所說^⑧：

努力要維持現代性最進步的意圖，但是認為這些意圖的達成，惟有通過脈絡性的策略，接受擬像物的浮現，拒斥整體性的視野，尋找新的結合和聯盟，並直接與過度真實的工具性生產掛鉤，也就是投身於已日漸後現代的世界裏，已經劇烈改變了的狀況，才能有所成就。

註譯

① 劉康亦有涉及此問題。參見劉康：〈全球化與中國現代化的不同選擇〉，《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號，頁140-46。在我看來，劉康的「中國現代化不同選擇」與中國「後現代」、「後殖民」之間不存在不可跨越的界限，二者在很大程度上指稱相同的問題。而在「現代化不同選擇」已告瓦解和失效之時，我不認為「現代化不同選擇」可與「後現代」、「後殖民」作出有效的區分。劉康富有啟發性的論點，實際上與中國的「後現代」、「後殖民」理論具有極大的相似性。

② 「後學」並不是一個有明確界定與表述的概念。最早使用這個概念的趙毅衡，實際上將幾乎所有在90年代中國大陸出現的文化現象均納入其中。但在近兩年的討論中，所謂「後學」日漸確指我和幾位運用「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工作的人的觀點。我不認為這一概念適切地表達了我們的工作，但作為一個約定俗成的概念加以「挪用」仍是一個權宜之策。這裏的使用完全是為了行文方便。

③⑩ 徐賁：〈甚麼是中國的「後新時期」？〉，《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號，頁82；82。

④ 張隆溪：〈多元社會中的文化批評〉，《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

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2月號，頁24。

⑤ 趙毅衡：〈「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2月號，頁13-14。

⑥ 孫津：〈後甚麼現代，而且主義〉，《讀書》，1992年4月號，頁19。此種論點的表述極多，不必一一列舉，可參閱《文藝研究》1993年第1期的一組討論文章，

⑦⑩ 同註①，頁143；145。

⑧⑨ 郭建：〈文革思潮與「後學」〉，《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6月號，頁116-122；122。

⑫ 實際上，1989年一直是「後新時期」概念的一個極重要的界標，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分析過1989年在文化轉變中的特殊意義。可參閱謝冕、張頤武著：《大轉型——後新時期文化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其中第10頁十分明確地提出：1989年乃是「一次告別、一次洗禮、一次突發式的斷裂、一個象徵性的界標」。雖然如此，我並不認為以90年代作為「後新時期」的開端與1989為開端有多麼巨大的差別。徐賁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多有缺失，也未能全面掌握有關材料。

⑬ 徐賁：〈「第三世界」批評在當今中國的處境〉，《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2月號，頁16-17。

⑭ 徐賁：〈從「後新時期」概念談文學討論的歷史意識〉，《文學評論》，1996年第5期，頁63；註⑩，頁79。

⑮ 這些分析可參見註⑩謝冕、張頤武書。

⑯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95年6月號，頁13。

張頤武 1962年生於北京。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從事中國當代文學及文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